

■ 大学文化研究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3.001

主持人语:

《重庆高教研究》编辑部同意开设“大学文化研究”专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使得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终于有了一个专门的发表和交流园地,必将对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和研究工作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大学文化是大学组织和活动的文化,是历史形成的理想大学生活方式,是大学理想、使命、价值取向、活动方式等的综合体现。大学文化一般可区分为大学的理念(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等不同层级,亦可区分为大学治理文化、科研文化、教学文化、管理文化等不同的亚文化,总体上构成大学的文化氛围。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是不断地解决现存大学文化的缺陷、优化大学文化体系、凝聚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精神力量,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自信。大学文化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目的在于服务、支撑和引领大学文化建设工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是一个专门以大学文化研究服务大学文化建设的分支机构,担负着带领全国高校开展大学文化建设政策学习、经验交流、学术研究、政策咨询等重要任务。21世纪以来,在王冀生、王义道、胡显章、杨河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我国大学文化研究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成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大学文化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系统总结我国大学文化建设的优秀实践经验,着力破解现存大学文化中的顽瘴痼疾,努力推进大学文化创新,增强大学文化活力和办学活力。

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开展全员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以及大学传承红色基因两个不同的角度贡献了作者的学术思考,共同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了值得讨论的学术主张和实践建议。热忱欢迎高等教育管理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关注该栏目并共同开展新时代大学文化的深入研究,以该栏目为平台发表高水平成果,持续贡献于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和我国高等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石中英

“两个结合”视域下全员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胡显章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修回日期:20251219

作者简介:胡显章,男,浙江温州人,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教育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文化研究。

引用格式:胡显章.“两个结合”视域下全员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3):310.

Citation format:Hu Xianzhang.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staff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6,14(3):310.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遵循与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全员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是涵育时代新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终极目标的核心路径。立足于高度的文化自觉,阐释了“两个结合”所开辟的广阔文化空间,为素质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与价值根基。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双重性,我们在激活其优秀基因的同时,必须警惕并消解沉积于民族心理中的消极因素,并以此作为文化选择与创新的前提。针对高等教育现实,重构融合人文与科学的教育体系,必须科学应对人文学科式微趋势,强化大学文化研究以滋养素质教育,借助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实现人文与科技的相互赋能。构建“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文化论”融合创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以“兼和”智慧引领教育实践。以“两个结合”为指引,加强全员全过程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是提升民族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更是通过教育的文化育人,应答“钱学森之问”、攀登世界科学与人文高峰的战略性选择。

关键词:“两个结合”;文化自觉;文化基因;文化素质教育;哲学思维;高等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3000308

一、文化自觉的内涵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先导意义

提高全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也是教育的根本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提升民族素质与社会文明提供了思想源泉和价值根基,也为教育发展指明了路径。在此背景下,深刻理解并持续增强文化自觉,成为推动素质教育深化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前提。

文化自觉首先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形成系统、理性的认知。费孝通指出,我们虽然生活在悠久的中华文化中,却往往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社会生活仍处于“由之”而非“知之”的状态^{[1]215}。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1]478}。这种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从“由之”到“知之”,并进一步迈向“信之”与“行之”,是文化自觉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文化自信自强得以确立的认知基础。文化自觉蕴含知行合一的实践导向,王阳明提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阐明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这一思想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契合,说明文化自觉不能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还应转化为自觉的教育行动与文化实践。费孝通强调,我们应以科学方法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承担起创造现代中国文化的责任^{[1]256}。文化自觉本质上要求我们超越对文化的碎片化理解,通过实事求是的系统认知,实现“知信行统一”,在扎实的认知基础上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将文化自觉提升到新的政治和思想高度,将其视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与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以及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这种觉醒和担当,为素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根基。在素质教育实践中,文化自觉的先导意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为素质教育提供价值引领,帮助教育工作者明确素质教育的文化根基和发展方向;二是为教育内容选择提供依据,从丰富的文化资源中筛选适合的教育内容;三是为教育方法创新提供思路,推动文化传承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只有在文化自觉的引导下,教育才能有效传承优秀文化,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当前,

我们应将文化自觉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通过构建文化育人课程体系、创新文化传承教学模式、营造文化育人校园环境,培养兼具文化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只有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引领下,素质教育才能为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二、“两个结合”为文化素质教育提供根本遵循与思想解放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为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基与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更彰显其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文化素质教育确立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为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终极目标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度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并系统阐述了人类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终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的发展历程。这一崇高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修齐治平”等思想精髓相互贯通,共同确立了文化素质教育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使命。

“第二个结合”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它打破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对立的思维定式,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一思想解放为文化素质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不仅促使我们以更加自觉自信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模式提供理论支撑。在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中,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凸显了民族素质竞争的本质性。虽然我国在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上取得显著成就,但国民道德素养、哲学思维水平等软实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面对这一现实,“两个结合”为提升文化素质教育指明了具体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立足文化自觉自省自信,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育人资源;秉持开放包容,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总之,“两个结合”从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为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它要求我们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体现鲜明的文化特色;既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又要注重其价值塑造;既要立足当前实际,又要着眼未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文化素质教育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的重要作用。

三、中华文化基因的双重性及其创造性转化

文化基因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的核心要素,承载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价值取向。如同生物DNA决定物种特性一般,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中华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既包含值得弘扬的优秀传统,也存在需要扬弃的历史局限。正确认识中华文化基因的双重性,并通过创造性转化使其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是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课题。

中华文化基因的双重性特征体现在多个层面。从积极方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智慧和价值理念。“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追求,展现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主张,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体现了厚德载物的胸襟气度,彰显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优秀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然

而,中华文化基因中也存在需要批判反思的消极因素。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积淀使得一些落后观念仍然影响着现代社会。“官本位”思想将官职高低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权力观和政绩观;“等级观念”强调尊卑有序,忽视平等权利,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存在冲突;“人情社会”注重关系网络,弱化法治精神,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保守倾向”强调循规蹈矩,抑制创新活力。这些消极文化基因需要我们以科学态度进行辨析和扬弃。

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基因的双重性,需要正视消极文化基因在当代社会的具体表现。在政治领域,“官本位”思想仍然有一定市场。一些干部“官念”根深蒂固,存在特权思想和官僚作风,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离。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5]这种现象与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熏陶加以改变。

在社会生活领域,“人情社会”的运作机制干扰着现代法治建设。在一些情况下,“关系”往往比规则更重要,“人情”往往比制度更有效。这种现象不仅影响社会公平正义,也阻碍了现代治理体系的完善,成为社会腐败的诱因。费孝通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剖析过传统文化中缺乏对权力的有效道德制约问题,这一分析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我们需要通过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逐步消除这种消极影响。

在思想观念领域,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以及宗法制度导致的保守倾向和经验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新活力。过于强调“师法古人”,盲目崇拜权威,缺乏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这些都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毛泽东关于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的论述,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新时代,我们更需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文化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首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使其与现代社会相融合。“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可以与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相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价值支撑;“义利统一”的价值追求可以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相结合,确立人文经济学,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可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呼应,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资源。通过这些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其次,勇于面对和改造消极文化基因。对于“官本位”思想,要通过制度建设、文化熏陶等多重途径,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6],为消除消极文化影响指明了方向。对于“人情社会”现象,要大力推进法治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对于保守倾向,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培育批判思维,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再次,在开放包容中推进文化创新。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全球化背景下,更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正是要求我们在自知自信的基础上,以开放心态推进文化创新。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照搬外来文化,而是在对话交流中实现文化的升华与发展。

在教育领域,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使命。学校教育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活动等环节,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注重批判性思维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使学生既能够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髓,又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高等教育机构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创新的功能,加强传统文化研究,推动学术创新,培养具有文化自觉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在社会建设层面,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生态环境。通过制度建设、舆论引导等多种方式,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优秀文化、抵制落后文化的良好氛围。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提升,发挥其示范

引领作用。邓小平同志关于“搞特权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5]的论断,说明消除消极文化影响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消极文化现象无处遁形。

在文化创作领域,立足当代实践,推出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用现代眼光和艺术手法展现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文化创作既要扎根传统,又要面向现代;既要保持民族特色,又要具有时代气息。通过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新的生机。

在国际交流层面,积极讲好中华文化故事。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新的发展。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费孝通曾说:“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全人类明天做出贡献。”^{[1]256}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我们要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更加创新的精神发展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这不仅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关系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持续推进中华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四、融合人文与科学的高等教育体系重构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当前,推动人文与科学深度融合的高等教育体系重构,成为回应时代需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自1995年教育部启动全面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体系。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也面临教育理念共识欠缺、教育资源分散未能形成高效合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不深入等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须我们从提高素质教育共识、实现教育体系重构的高度推进人文与科学的深度融合。

高等教育体系重构的首要任务是遵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的国家战略要求,将通识教育融入素质教育全局,形成合力。在此基础上,突破人文与科学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既体现在学科设置上人为的文理分科,又表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过度强调专业分化而忽视综合素质培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报告中就指出,大学必须进行深刻变革,以应对价值危机带来的挑战。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宗旨,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发展的哲学基础,要求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必须超越单一技能或知识的局限,构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推进体系重构的具体路径上,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改革。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跨学科交融的课程体系。通过推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实现文理渗透、交叉融合。具体而言,应当精心设计融通性课程体系,鼓励跨学科教学与研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以及专业素养培育的有机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还要特别重视经典研读与文化遗产,将《道德经》《大学》《论语》等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著作纳入教学体系,通过不同教育阶段的持续学习,促使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得以传承和创新。同时,着力打造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网络空间“四位一体”的育人场域,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培养体系。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需要积极推动教育教学方

法创新。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从标准化教育向个性化培养的转变。通过构建智能教学平台,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诊断和精准施策,真正落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技术赋能与人文引领的平衡。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同时,还要特别强化批判性思维培养和深度学习引导,避免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认知依赖。着力推动“以人文为技术立心”,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正如我们在教育实践中看到的,只有将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才能培养出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情怀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高等教育体系重构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深化大学文化建设,为素质教育提供丰厚的土壤。大学文化承载着精神理念、价值追求和制度规范,是育人的重要资源。通过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的协同建设,营造良好的育人生态。同时,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改变单一学术导向的评价体系,构建多元综合评价标准,将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等纳入评价范畴。建立跨学科合作的激励机制,促进不同学科背景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些制度保障是确保人文与科学深度融合的重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要正确处理好几对重要关系。一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要传承中华优秀教育传统,又要面向未来,改革创新;二是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既要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又要强化人文素养的熏陶;三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要重视知识传授,又要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四是本土与国际的关系,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又要具有国际视野;五是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融合的视角,破除西方经济学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影响,通过学科的融合,推进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和路径创新,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呼应,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创造全方位和谐并进的文化生态。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是确保高等教育体系重构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前,我们特别需要科学应对人文学科式微趋势。大学不能没有人文学科,特别是在技术主导加速时代,面对人类社会诸多问题与人的精神困扰,人文学科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不仅不能萎缩,反而需要进一步放大^[7]。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单纯的技能培养已经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打破文理分科的传统界限,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比如,在工程教育中融入伦理思考,在医学教育中加强人文关怀,在理科教育中注重哲学思维培养,在人文教育中增强科学素养。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应该深入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中。教师要自觉打破学科壁垒,在教学中自然而然地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合起来,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全面的成长。

高等教育体系重构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从理念更新、体系优化、方法创新、制度保障等多个层面协同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通过人文与科学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教育教学体系,优化学校治理结构,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的根本目标。这不仅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五、构建融合创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

作为文化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哲学思维对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论断“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8],揭示了哲学思维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这一论断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德国能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正是得益于其深厚的哲学传统。正如前科协主席周光召所指出的,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通过发展辩证法和唯物论,为科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9]。特别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德国现代大学之父”洪堡“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由科学达至修养”等新人文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成功实现了哲学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为探索“完人教育”开拓了道路。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哲学思维的培育。从孔孟老庄的思想经典,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哲学思维,都体现了深厚的哲学智慧。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邓小平倡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学哲学、用哲学”传统,为新时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实践充分证明,哲学思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构建系统的哲学基础尤为必要。马克思指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10]。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哲学与肩负文化传承创新使命的教育本质联系。基于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融合创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即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有机统一。认识论哲学强调大学对真理的追求,这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在这一哲学基础上,大学应坚持学术自由和建设性批判精神,鼓励师生追求真理、探索未知。同时,认识论哲学也要求大学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具备宽厚的知识基础和创新能力。正如约翰·S.布鲁贝克所言,学术自由的合理性首先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11],这意味着大学必须保持对真理探索的独立性。政治论哲学凸显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大学不仅要追求真理,更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这一哲学基础要求大学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家国情怀、天下责任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特色,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政治论哲学体现为大学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同时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这就需要大学在坚持真理追求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生命论哲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开拓其精神生命。这一哲学基础要求大学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其自主学习和终身发展的能力。生命论哲学将教育的焦点回归到人本身,强调教育应当促进个体生命的丰盈与超越。文化论哲学是大学持续发展的保障。教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大学文化承载着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哲学研究会理事长石中英指出:“在教育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12]这说明文化因素始终渗透于教育全过程。文化论哲学要求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

以上4种哲学基础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认识论是根基,政治论是导向,生命论是核心,文化论是保障,它们共同构成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在实践中,我们需要以“兼和”的智慧推动“四论融合”。张岱年提出的“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哲学观^[13],以及钱学森倡导的“大成智慧学”^[14],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推动“四论融合”需要从多个层面着手。在理念层面,深刻认识4种哲学基础的内在联系和互补性;在实践层面,将哲学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实践;在制度层面,建立促进“四论融合”的体制机制。特别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要着力促进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的根本目标。

总之,构建“四论融合”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哲学基础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又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体现时代特色。它将成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2627.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08.
- [5]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M]//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 [6] 中央政治局就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EB/OL].(20130420)[20251215].https://www.gov.cn/ldhd/201304/20/content_2383258.htm.
- [7] 阎光才.大学文科的式微及其教育价值重审[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5,23(2):324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7.
- [9] 胡显章.提高哲学自觉自信深化文化素质教育[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20,24(1):15.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8.
- [11]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7:42.
- [12]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89.
- [13] 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78.
- [14] 钱学森.大成智慧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56.

(责任编辑: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张海生)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Staff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Hu Xianzha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China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al powerhouse, the whole process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staff is the core path to cultivate new talents of the times and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modernization, which i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Based on a high level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t elucidates the vast cultural space opened up by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provides a profound ideological source and value foundation for quality education. The genes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duality. While activating its excellent genes, we must be vigilant and dissolve the negative factors deposited in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take it as a prerequisite for cultural selection and innovation. To address the re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construct an educa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humanities and science,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respond to the trend of the decline of humanities disciplines, strengthen university cultural research to nourish quality education, and leverage technological mean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chieve mutual empowerment between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 Build a higher education philosophy foundation that integrates and innovates epistemology, political theory, life theory, and cultural theory, and lead educational practice with the wisdom of “harmony and integration”.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two combination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 staff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a strategic choice to answer the “Qian Xuesen Question” and climb the peak of world science and humanities through cultural education.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genes; cultural quality educatio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